

海外移民潮背景下 留守老人代际情感影响分析

——以北京市为例

李超 王雷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2249)

[摘要] 本文利用北京地区子女移居国外的老年人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子女移居国外而其老年父母留守国内居住的新移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因素。这些老年父母认为女儿、已婚且育有孩子、提供日常照料、收入越高、越孝顺的子女,与自己的关系越亲近。同时,自身身体健康状况越好、非独自居住的老人,越趋向认为其与子女的情感更亲密。移居国外的子女与国内居住的子女在对父母情感支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老年父母与移居海外的成年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并没有由于空间距离拉大而疏远。

[关键词] 新移民家庭;子女定居国外;老年父母;代际情感支持;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4) 07-0057-0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407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通过留学、投资、探亲等形式移居海外的人数不断增加。《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显示,从1978年至2012年底,中国共有264.47万人出国留学,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输出国,而同期留学回国人数累计为109.13万人,^{[1](P2-4)}大量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海外工作继而成为“新移民”。

所谓“新移民”,一般是指“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2]与改革开放前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居民相比,新移民不论在移民分布、动机还是方式方面,都有着显著差异。^[3-4]这些新移民亲身经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他们在海外“扎根”后,其仍在国内居住的日益年迈父母因

养老、健康、孤独等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留守群体。

根据区位学理论,人们的空间距离反映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距离。^{[5](P14-19)}新移民家庭中在国内居住的老年父母与其移居海外的成年子女之间的情感纽带是否会由于空间距离的拉大而日渐疏远?定居国外的子女与国内居住的子女相比,与老年父母间情感支持是否存在差异?哪些因素将影响老年父母对子女情感支持的评价结果?本文选取北京市新移民家庭中的老年人作为调研对象,希望借此对上述问题予以剖析和回应。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针对海外华人移民家庭代际情感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子

[收稿日期] 2014-02-16

[作者简介] 李超(1976-),女,辽宁沈阳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雷(1991-),男,河南安阳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本科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RK019);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21707)

女教育角度,研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的代际冲突问题;^[6]第二,从代际沟通视角,研究老年父母与孙子女的代际关系问题;^[7]第三,从家庭支持与孝道视角,研究老年人照料责任问题;^[8]第四,从文化适应视角,研究老年人如何在文化冲突中进行调适等问题。^[9]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对早期来自港台地区,或是父母先移居国外、子女一并随迁,抑或是子女先移居国外、父母后跟随子女定居海外的移民家庭代际情感关系的探讨,缺少针对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移居海外成年子女与其仍留守在国内居住的老年父母之间代际情感关系的研究。

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与西方社会在家庭代际关系上根本差异的经典概括是:前者是反馈模式,后者是接力模式。^{[10][186]}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当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有两类对立观点:一是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平衡模式被打破,在失衡中正走向或类似“接力模式”;^[11-12]二是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并未出现根本性变化,而仅是居住形式等细节缓慢改变。^[13-15]同时,研究大多局限于家庭成员都在国内的代际关系探讨上。^[16-17]

关注子女移居国外的空巢老人家庭代际情感关系的研究非常有限,陈文玲通过对北京市B大学近30位子女定居国外的离退休教职工进行调查,认为这是一种“亲而不近”的亲子关系,而不是“分而不离”。^[18]这篇文章的重要贡献是将城市空巢老人群体中的特殊人群——子女移居国外的高校退休教职工空巢家庭代际关系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但受样本规模等原因限制,没有使用定量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剖析,而且“亲而不近”并非“分而不离”的亲子关系是否是这一群体的标志性特征,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将运用定量方法分析子女移居国外而其老年父母留守国内居住的新移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因素,并据此揭示其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政法大学与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三校部分教师在2012年6月到2012年7月进行的“北京地

区子女移居国外的老人家庭生活状况调查”合作研究课题。调查对象为至少有一个子女在国外获得绿卡或已成为外国公民的60周岁以上、居住在北京地区的老人。调查地点选取了海淀区老年大学、高校教师集中居住的社区(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海淀区育新小区等)。调查获得老年人样本量为293个,其存活子女共有588人。

2.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具有嵌套结构,即同一个接受调查的老人可能有多个存活子女,他们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这种共同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赡养对象在社会人口特征上的一致性和子女家庭教育、社会机遇上的一致性。因此,采用多水平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简称HLM),同时将子女和父母两层变量纳入模型,以控制老人社会人口状况上的一致性;在层二的截距模型中纳入随机变量,以控制同一家庭的子女在教育机遇上的一致性,消除来自同一家庭子女的整群效应。本文使用HLM6.08软件,采用REML(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方法估计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和方差,以White提出的稳健标准误(Robust Standard Error)作为检验的基础。

3. 变量测量

因变量是老年人对来自其成年子女情感支持的主观评价,具体的测量指标采用代际强化清单方法(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ventory),^[19]通过三个问题来回答:①“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上亲近吗?”②“当您想跟这个孩子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他(或她)愿意听吗?”③“总的来讲,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孩子相处的好吗?”对于每个问题,分值范围是从0至2(0=“不亲近/不愿意/不好”,1=“有点亲近/有时愿意/还可以”,2=“很亲近/愿意/很好”)。研究中,将老人对每一个子女情感支持的主观评价加总求和,分值范围是从0至6。然后,从受访老人对其所有子女情感支持评价中选择一个分值最高的子女评价作为因变量。从表1可以看出,其均值为5.17。

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主要包括子女的个人特征

和老人的个人特征两部分。

子女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社会人口特征，孝道等家庭特征，“是否为移民子女”“出国时间”等移民因素，“是否为老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是否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料”等代际支持因素，以考察子女提供代际情感支持的能力及其定位。其中，年龄、孝道、年经济收入、出国时间为连续变量，其余设置为虚拟变量。“孝道”通过问题“总的来说，您觉得这个孩子孝顺吗？”来反映，答案分为“非常不孝顺”“不太孝顺”“一般”“比较孝顺”和“非常孝顺”五个等级，分数越高，表明子女越孝顺。子女的年收入用其对数运算值 $\ln(N+1)$ 表示。“出国时间”通过子女第一次出国至父母接受访谈时回答的时间来表示。

老人的个人特征主要考察社会人口变量、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子女总数等资源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情况、独立经济收入、自我健康评价、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子女总数等。其中，年龄、独立经济收入（取自然对数）、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子女总数为连续变量，其余为虚拟变量，以取值为0的分类作为参照项。生活自理能力采用的是国际上通用的ADLs和IADLs方法，具体包括6项日常生活能力（ADLs，具体包括吃饭、穿衣服和脱衣服、上厕所、下床或从椅子上站起来、洗澡和在室内走动）和5项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s，具体包括做饭、买东西、乘坐公交车、做家务和管理家庭钱财），从“不费力”“有些困难”到“做不了”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不费力”取值为2，“有些困难”取值为1，“做不到”取值为0，累计分值越高，老人生活自理能力越高。老年人自我健康评价通过问题“您认为您自己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怎样？”来反映，回答为“很好”“好”“一般”“不好”四个变量，得分越高，自我评价越好。

四、主要结果

1. 主要变量描述

表1对样本变量分布进行了描述。从老人角度看，男性占48%，比女性稍少一些。样本中

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5.62岁，最低年龄是60岁，最高年龄是96岁，标准差（S. D.）是7.23，70岁及以上的老人占80%，其中，70-79岁老人占近一半左右。接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受访老人接近3/4，已婚老人约占80%。12%的受访老人是独自居住，与其他人同住（含配偶、子女、儿媳、女婿、孙子女、其他亲属、其他无亲属关系的人）的老人约占88%。老人的独立经济收入较高，平均年收入为9.2万元。从老年人健康

表1 样本变量描述变量比例/均值

变量	比例/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子女变量				
情感支持	5.17	1.18	0	6
性别(男)	0.44			
年龄	45.62	7.60	24	70
已婚	0.90			
育有子女	0.80			
收入(取对数)	12.16	1.00	0	17.22
未回答	0.40			
孝道	4.38	0.78	1	5
移民	0.57			
出国时间	17.64	0.38	0	38
提供经济支持	0.63			
提供日常照料	0.39			
老人变量				
性别(男)	0.48			
年龄	75.62	7.23	60	96
独居(是)	0.12			
健康状况	20.86	2.77	6	22
收入(取对数)	11.30	0.60	7.7	13.28
子女总数	2.02	0.80	1	6

指标看,大多数老人健康状况较好。老人生活自理能力较高,平均水平为20.86,分值范围从0至22。相比之下,老人的自我健康状况评价并不高,只有1.54,分值范围从0到3。老人的子女数量平均为2个左右,平均有1.18个子女在国外居住,在国内居住的子女人数平均为0.84人,其中,在北京居住的子女数量平均为0.80人。

从子女角度看,样本中共有存活子女588人,儿子占44%。子女的平均年龄为45.62岁,大多已经步入中年。已婚子女占90%,而且80%育有子女。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硕士学历的子女占30%,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子女占16%。子女的年平均收入为40.21万元人民币,其中国外子女年平均收入更高(49.28万元人民币)。受访老年父母对子女是否孝顺给予了很高评价,平均为4.38,分值范围从0到5,其中国内子女孝道均值为4.39,国外子女的孝道均值为4.36,国内外子女的孝道没有显著差异。提供给父母经济支持的子女较多,占子女总数的63%;而提供日常照料的子女较少,占子女总数的39%。从移民因素来看,样本中有57%的子女移居国外,平均出国时间为17.6年,出国时间从0到38年不等,标准差为0.38。总体来看,移民子女在国外居住时间较长。

2. 主要结果

表2的随机效应显示,老人对子女情感支持认知程度的零模型分析中,组间方差成分为1.187,层一残差成分为0.299,组间差异所占的比例为79.88%,对组间差异的卡方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按照寇恒(Cohen, 1988)所建议的判断标准属于高度关联强度,组间差异不可忽略,^{[20](P48)}因此有必要进行多水平分析。控制子女和父母两层变量后,最终模型解释了家庭间情感支持评价差异的29.74%以及家庭内情感支持认知差异的18.73%,解释效果良好。最终模型信度0.859,可信程度较高。

表2显示了老人对子女情感支持评价的多水平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最终模型表明,老人认为儿子与自己的关系不如女儿亲密。同时,已婚子女更能够理解自己,为其提供较

高的情感支持,但当成年子女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老人荣升(外)祖父母后,子女与老人的亲密程度有所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子女精力将向自己的子女倾斜的缘故。但即便如此,已婚且生育的子女与父母的亲近程度仍高于未婚子女。子女的年收入水平越高,其与老人的情感关系越亲密;由于提供日常照料的子女更了解老人的起居生活,因而其提供了更多的情感支持。子女越孝顺,老年人越感觉其与自己的关系亲密。

分析表明,移居国外的子女与国内居住的子女在对父母情感支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可以看出,孝道不仅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现代社会,尽管子女旅居国外多年,受西方文化熏陶,孝文化在新移民家庭代际情感关系中的重要性仍不言而喻。成年子女对其老年父母是否孝顺,对于老年人自我感知来自其子女的情感支持仍具有重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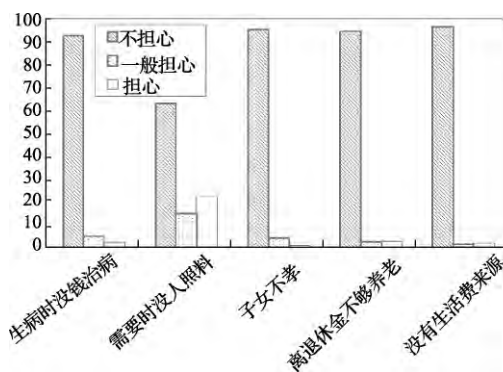


图1 被访老人对生活担忧问题及比例 (%)

从老人角度来看,与非单独居住的老人相比,独居老人与子女的情感关系比较疏远。这表明居住安排对老人的情感慰藉有重要影响。此外,老年人身体功能障碍越少,身体越健康,其子女与自己的关系越亲近。对于这些子女移居国外的受访老年父母而言,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相对稳定的退休金收入以及较好的医疗保障水平,因此,他们与城市普通退休老人相比,晚年可以维持相对体面、充裕的生活。但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

身体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特别是生病时身边缺少子女照料。这点可以从问卷里询问老年人对生活担忧问题的回答中得到印证。在受访老人对生活所担心的众多事项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需要时没有人照料”，“担心”比例占 22.2%，而担心诸如“生病时没钱治病”“子女不孝”“离退休金不够养老”“没

有生活来源”等问题的比例均在 3% 以下，如图 1 所示。老年人如果身体比较好，则他们就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日常生活，基本不需要他人照料自己的饮食起居，对于子女在生活上照料自己的要求也不强烈。因此，老年人身体健康情况与其自我感知来自子女的情感支持呈正相关关系。

表 2 老人对子女情感支持评价的 HLM 回归分析

自变量	零模型		随机系数模型		最终模型	
	β	SE	β	SE	SE	β
子女变量						
性别(参照组:女性)					-0.112*	0.057
年龄					-0.002	0.006
婚姻状况(参照组:非已婚)					0.331*	0.154
育有子女(参照组:无子女)					-0.173*	0.082
年收入(取对数)					0.018*	0.008
收入未知					0.241*	0.092
子女孝顺					0.619***	0.116
移民子女(参照组:国内子女)					0.029	0.120
出国时间					-0.006	0.006
提供经济支持					-0.031	0.086
提供日常照料					0.161*	0.071
老人变量						
性别			0.180	0.128	0.154	0.116
年龄			-0.007	0.011	-0.008	0.011
居住安排(参照组:非单独居住)			-0.658*	0.265	-0.528*	0.217
健康状况			0.096**	0.031	0.067**	0.025
年收入(取对数)			0.120	0.111	0.073	0.093
子女数量			0.147+	0.087	0.108	0.081
常数项	5.139***	0.068	2.002	1.703	0.348	1.574
U0	1.187	1.048	0.834			
解释组间差异的比例	—	11.71%	29.74%			
R	0.299	0.299	0.243			
解释组内差异的比例	—	0%	18.73%			
信度	0.875	0.861	0.859-2LL	1587.966	1572.230	1485.266

注: + < 0.1; * < .05; ** < .01; *** < .001

五、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后，随着留学、移民大潮日益升温，子女移居国外而留守国内居住的老年父母人数也在逐年攀升，他们中的大多数为空巢老人，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综合本文分析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移居国外的子女与国内居住的子女相比，在对父母情感支持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孝文化在新移民家庭代际情感关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留守国内居住的老年父母与移居海外的成年子女之间的情感纽带并没有由于空间距离的拉大而日渐疏远，相反却表现为两代人互相牵挂，面对现实有诸多“无奈之举”，陷入“两难困境”。

从移居国外的子女角度看，他们是继续留在国外发展，还是举家回国定居从而与父母团聚？这个问题可以从问卷中得到启示。当问及老人“其子女是否有回国发展计划”时，有近85%的老人表示其在国外工作的子女没有回国发展计划；但当进一步追问“其是否希望子女回国发展”时，表达“希望”子女回国发展意愿的老人约占65%，明确表示“不支持”子女回国发展的老人约占20%，有15%受访老人表示“很难说”。在“希望子女回国发展”的理由中，很多老人都表示“想与孩子团聚，方便照料”，“自己想孙子、孙女，想儿子落叶归根”，“自己年纪大了，子女回国有个照应，有人照顾自己”，“一家人常见面、家庭氛围好”，“想念孩子，自己又去不了”，“回国有归属感”等等。“不支持子女回国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儿女年龄大了，在国外有稳定工作，习惯国外生活”，“孙子女已经扎根国外，很难适应国内教育”，“子女在国外时间长了，在中国没有发展基础，不了解国内情况”等。由此可见，对于居住在国内的老年父母而言，虽然仅有少部分定居国外子女有回国定居意向，但从父母内心愿望而言，仅有1/5的老人表示“不支持”子女回国发展，大部分老人都“希望子女回国”或是“既希望子女回国、又担心子女回国面临很多实际困难的无奈”。此时，定居国外的子女虽然想在老年父母身边尽孝道，但面

对现实诸多困难，多数成年子女还是选择继续留在国外发展。

对于老年父母而言，是出国定居与子女团聚，还是留在国内与子女相隔万里？问卷中我们将受访老人分为两类：曾去过子女定居国家和从未去过子女定居国家的老人。有70%的受访老人表示曾经去过子女定居的国家，其中，29%的老人表示“不喜欢这个国家的生活”，26%的老人表示“一般”，45%的老人表示“喜欢这个国家的生活”。“喜欢这个国家”的原因主要包括“孩子在国外”，“环境好、空气好、污染少”，“食品安全”，“物质生活好，人文环境好”等。“不喜欢这个国家”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文化差异”，“生活不习惯、语言不通”，“朋友圈子都在国内，在国外生活不适应”，“子女平时上班、一个人在家寂寞孤独”等。在余下的30%从未去过子女定居国家的受访老人中，有30%的老人表示“想去看看”，有65%的老人表示“不想去”，有5%的老人表示“很难说”，如图2所示。当被问及“您为什么想去这个国家”时，回答有“看孩子、看孙子”，“想孩子”，“感受外国人生活，顺便旅旅游”等。“不想去这个国家”的原因主要包括：“年纪大了，不方便出国”，“谁也不认识，周围邻居都住得很远，买什么都不方便；孩子们上班了，自己在家没意思”，“身体不好”，“不想给儿女添麻烦”等。由此可见，老年父母从内心深处非常渴望和身在国外的子女团聚，但受现实困难所迫，很多老人不得已选择在国内独自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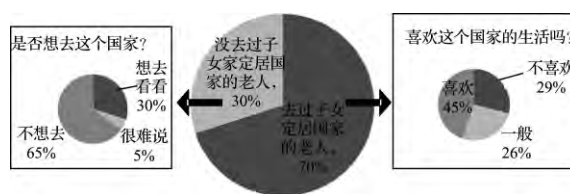


图2 两类被访老人是否喜欢或想去子女定居国家所占比例

第二，在有子女移居国外的中国老人家庭中，反馈模式并非为接力模式所取代，而是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价值和现代化背景合力作用下的新代际互动关系。不论对于移居国外的成年子女，还是

身居国内的老年父母而言，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依旧是紧密的，并不像陈文玲对北京市 B 大学近 30 位子女定居国外的离退休教职工调查所得出的结论那样，认为这种亲子关系不是“分而不离”，而是“亲而不近”。^[18]这些家庭中两代人需要共同面对家庭压力和风险，因此，理性选择的结果则是相互妥协、共谋发展。在此情形下，两代人互相理解、互相牵挂，面对现实诸多无奈，多数成年子女选择继续留在国外发展，而老年父母选择在国内独自居住。而当老年父母的身体健康指标每况愈下、需要有人在身边照料时，这种“留，还是回”的两难抉择，让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的亲情纽带面临“终极考验”。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前面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即老年父母认为子女越孝顺、自身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其认为子女与自己的感情越亲近。一旦老年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生病需要子女照料，而儿女远在海外、不能在床前尽孝时，父母晚年孤独无助、

对儿女的思念之情便与日俱增，其和身处国外子女的情感纽带便会被削弱。

第三，移民家庭中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向“女儿偏好”转变。这与以往对城乡移民及城市居民代际支持的研究有很大差异。以往学者认为中国的父系家族制形成了主要依靠儿子的养老方式，虽然外出女性正在缩小这种性别差异，但依靠儿子的传统养老方式仍占主导。^[21-23]对于移民家庭而言，老人认为儿子与自己的关系不如女儿亲密，这与女儿给予父母更多情感慰藉有很大关系。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样本中绝大多数老人退休前在高校工作，文化程度较高，对于新移民家庭中在国内居住老人的状况可能缺乏足够的样本代表性；其次，由于缺少对身在国外的国内的成年子女访谈，弱化了子女方面的特征与需求。未来进一步研究应该利用纵向数据，从子女和父母双方角度进行对家庭关系的完整分析。

注释：

- [1] 王耀辉, 苗绿编著.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3 版 No. 2)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 [2] 张秀明. 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1 (1).
- [3] 傅义强. 改革开放以来欧盟国家中的中国大陆新移民 [J]. 世界民族, 2009 (1).
- [4] 庄国土. 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 [J]. 世界民族, 2009 (1).
- [5]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 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6] Masako Ishii-Kuntz.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American [J]. Family Relations, 2010, 46 (1).
- [7] Judith Treas. Four myths about older adults in America's immigrant families [J]. Immigration in an Aging Society, 2008 (2).
- [8] James H. Liu, Sik Hung Ng, Ann Weatherall, Cynthia Loong. Filial piety, accultur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mong New Zealand Chinese [J].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22 (3).
- [9] Sabrina T Wong, Grace J Yoo, Anita L Stewart.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Family Support among older Chinese and Korean immigrants [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2007, 61B, 1.
- [10]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C] //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 [11] 刘桂莉. 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研究 [J]. 南昌大学学报, 2005 (11).
- [12] 贺雪峰. 农村代际关系论: 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9 (5).
- [13] 边馥琴, [美] 约翰·罗根. 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1 (2).
- [14] 康岚. 论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代差视角 [J]. 中国青年研究, 2009 (3).
- [15] 杨菊华, 李路路. 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09 (3).
- [16] 周晓虹. 冲突与认同: 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 [J]. 社会, 2008 (2).
- [17]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 [J]. 江淮论坛, 2011 (2).

- [18] 陈文玲. “亲而不近”: 城市知识分子空巢家庭的亲子关系——以北京市 B 大学退休教师养老状况为例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8 (2).
- [19] Mangen, D., Bengtson, V. L., & Landry, P. H., Jr. (Eds.).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M].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92.
- [20] 温福星. 阶层线性模型的原理与应用 [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 [21] Lee, Y. W. Parish, and R. Willis.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Taiwa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99 (4).
- [22] 史薇. 北京市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1 (6).
- [23] 张烨霞, 靳小怡, [美] 费尔德曼. 中国城乡迁移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3).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Cohesion of Elderly Parents in Beijing under The Impact of Adult Children Residing Abroad

LI Chao, WANG Lei

(Business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family life of older adults whose children reside abroad in Beijing, this paper has examined the impact of adult children's residing abroad on elderly 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cohes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elderly parents tended to feel closer with children who were daughter, married and had babies, wealthier, more filial and provided instrumental support. Furthermore, if parents did not live separately and had better health conditions, they would feel intimate with their children. The emotional cohesion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has not been separated by distance.

Keywords: new immigrant family; children residing abroad; elderly 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emotional cohesion; Beijing